

## 冬日暖阳

潘群飞



风雨终于把空中的雾霾擦洗干净。阳光一照，天地间一片温暖敞亮。母亲见我这几天心情有些烦乱，提醒我别闷在屋里了，出去散散心。

电瓶车迎着清风缓缓前行。阳光很活跃。一会在香樟叶间穿梭，一会爬上车顶变幻七彩，一会在河面轻盈跳跃。好多棉被都出来晒日头了，也有几个老人在屋前闭目养神，身边的小狗陪着打盹。一路上，车来人往，大家各自忙着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忙碌中充实踏实，在忙碌中快乐幸福。置身这样匆匆的节奏，一种说不出的美好从我心头悄然滑过。

前面服装厂门口人头攒动，横幅广告也格外诱人，“六折优惠，买件新衣服回家过年”。几个打工女人拎着新羽绒服说笑着出来，一路聊着回家买车票的事。路有点堵，秩序还不错，大家在阳光下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挪。西面的屋檐下，坐着一个大腿绑着纱布的男人，一脸愁云。大概僵硬的四肢慢慢被阳光烘暖了，他伸了个懒腰，可眉头还是不愿舒展。忽地，微闭的双眼泛起一抹亮光，脸上也渐生笑意，像春风吹过一池死水荡起的阵阵涟漪。原来，不远处几个青年男女正说笑着向他走来，是来探望他的亲朋？同学？我不得而知，反正这个冷清的角色很快就被笑声填满。

想起这几年冬天，也经常有人带着阳光走进我家的平房。有朋友，有同学，也有从未谋面的文友。前几年中午，一位身材瘦长的女人拎着礼物笑吟吟地出现在我面前。她说她从我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里知道我曾遭遇过意外，身体不是太好，特来看看我。我感动得不知所措。后来才知她姐姐是植物人，自己也刚离婚不久。我实在过意不去，让她以后别来了，她还是来。她在微信里说，天气一点点在变冷，心里总放心不下他们，虽然也只是去看看，但去了之后心里总能坦然一段日子。

路过同学的照相馆，我又自然地拐了进去。无聊、郁闷、空闲时喜欢去她那儿坐坐，喝茶聊天，尽享轻松随意。同学人微胖，说话慢悠悠的，脸上总挂着淡淡微笑，是一个知足常乐的慢性子。我们正聊得尽兴，她丈夫来了，看起来有点郁闷，说在城隍庙的那家店快半月了，还没有生意成交。同学劝他，别急呀，有些喜悦是慢慢来的，知道吗？呵呵。说完，又转向我笑笑，似乎也在安抚我，她大概从刚才的聊天里捕捉到了我的焦虑。丈夫轻拍了一下她的头，阴着脸露出了一丝阳光。

从店里出来，发现车胎很瘪，同学带我去西街。穿着红羽绒服的她骑着自行车轻快地在我面前带路，清幽的小弄似乎多了些许的亮色和暖意。跑了好几家修电瓶车的，都忙着摆弄零件，无暇给我充气。终于在桥边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门口看见一大一小两个打气筒。中年男人在里面埋头修鞋配锁，在路人的请求和感谢声中，不时点头微笑。很显然，打气筒是专门为路人免费服务的。阳光穿过对面林立的高楼间隙贴地落在他那张有些老相的脸上。替我打足气，同学又一路护送我过了国道的红绿灯。

我特意放慢车速，让暖洋洋的感觉陪我到家。那个大腿受伤的男人还坐在门口，斜着身温和地看着家人轻轻拍打已晒得丰满柔软的棉被，灰尘和细棉絮纷纷随风而去。不知他的心情是否也晒得松软？但愿那些残留在棉被上顽固的病菌，烦恼的残梦，甚至几滴伤感的泪痕，也都随风而去。但愿他今晚闻着阳光的味道，一夜好梦。

忽然想起一位作家在散文《冬日暖阳》里的一句话：人生的路上，我努力去遗忘曾经的伤害，而将那点点滴滴的温暖一一攒起，积攒多了，心里就有一轮太阳。

## 灶与柴，可以疗伤

札拉里·琴

是谁说过的，疗伤的最好方法是离开，取暖的最好方法是回家。我想，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他的泪水一定在静夜里奔跑过，他的心跳一定在擦过往事之痛时稳住了细小的波澜，他的脚步里一定有根指南针，眷恋着家园的方向，随时准备奔赴。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仿佛眼见母亲在灶前支柴弄火，火光的红映在母亲的脸上，晶莹的泪滴已在火光的暖映中烘干水分，面庞上渐渐团起两块富有生气的红晕。我已然确证：在北方，取暖的最好方法是坐在火炕上，疗伤的最好方法是坐在灶前，支柴烧火。

北方的林区小镇，火灶给予一家人一日三餐，也给予一家人日日夜夜的温暖。几乎家家户户都把拾柴、劈柴作为日常劳作。一般情况下，日日垒高的柴火垛总是在当年的夏秋之际最高，又在次年的春夏之交用到几乎见底。烧火可是一件有学问的事，用哪一种松明子引火，几分干的柴可以入灶，往灶里码柴的高低深浅，都不是一两天可以掌握的功夫。而且，火灶也是有记忆的，它“认生”。因为，第一次在灶里烧火的人，往往掌握不好灶的脾气，拿不准该把柴放得深一些还是浅一些，还有可能会烧出呛人的烟气来。

自记事起，我感到母亲是喜欢烧火的。在灶前，忙碌了一天的母亲终于以温暖的方式停歇下来，她坐在光滑的矮凳上，沉静时光罩在四围，也让我们几个孩子的内心十分笃定。有时，灶膛里的火不旺的时候，她会一手拿起老蒲扇鼓风，一手用火钩子拨柴，直到柴火烧得热烈，炊烟顺畅了，就开始忙活饭食了。夏天天气炎热，但也不能睡冷炕，烧火就需要恰到好处火候，这对母亲的烧火功夫来说是游刃有余的。还是冬天麻烦。冰天雪地的冷裹着房子，火墙、火灶必须生机勃勃才能让房子成为温暖的中心，度过又一个数九寒天。为此，母亲成了家里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输送温暖的人。常常在后半夜，睡意朦胧的我们又感到新一轮的温暖在被褥下升腾，睡得更加香甜了。母亲常说，灶不能空，灶是一户人家的胸膛，是日子的胸膛，有火苗，有热量，这日子才会过得有些暖意。后来我才领悟，母亲爱烧火的秘密原来不只是这个原因。

幼时看到母亲在灶前擦眼泪，我还以为是烟熏火呛的缘故，大点以后才明白，原来在灶前一隅，熊熊燃烧的柴能最好地掩饰母亲熊熊燃烧的哭泣，她把脆弱的一刻向灶膛敞开，自我疗伤，自我引渡，转身又呈现给我们一个坚强的母亲。想想也是啊，父亲去世以后，母亲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有多少辛酸无处诉说！那些年，我们不知道，在灶前的母亲，被泪水洗劫过多少次？我们不知道，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如何以坚强的心灵和不屈的意志，在破碎的天空下为孩子们挡风遮雨，支起了孩子们的天空！

## 牵挂与企盼

牟成佳

刚参加工作第一年，春节临近，看着满街步履匆忙的行人，拎着大包小包地赶着回家过年，想家了。家远在几千里外的高原，忐忑不安地向单位领导请假，领导听后，非常豁达地说：“做儿女的回家看望父母，应该的，请代我向你父母问好！”

工作还在实习期，没多少钱，去超市给年迈的爷爷奶奶、父母各自买了套保暖内衣，还有些当地的土特产。进入高原，隧道多起来，车速明显慢了下来。火车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中穿过一个接一个的涵洞，走走停停。窗外黑洞洞的，只听见火车穿越隧道咣当咣当的单调声音，想到回家的路越来越远，心里有了些许的温暖。

到家了，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气味迎面扑来。奶奶和母亲坐在火炉前取暖，乍见我，母亲满脸泪水。两年未见，老母亲已满头银发，冬日阳光下，几粒炭灰粉尘飘忽在母亲花白头发之间，我含糊不清地叫了声：“妈，我回来了，爸做什么去了？”心里无语哽咽。

轻轻走进里屋，年近九旬的爷爷还在床上睡觉。爷爷已明显老去，发须中夹杂霜雪，一如冬日晨霜下大片的稻茬，黝黑的皮肤在灯光下泛着漆雕般的微光。爷爷身体一

直很好，耳不聋，眼不花，牙也很齐整，睡眠和胃口也好，就是人老了，脚软，拖不起身子，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父亲背衣肥上地里去了。冬天，正是给土地补充农肥的季节，开春就可以直接下种。母亲为我煮了碗鸡蛋面，真香。白天每日跟着父母在田间劳作，傍晚陪爷爷小酌几杯，生活清闲恬淡。闲来无事，搀扶着爷爷奶奶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散步。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冬耕的老牛，旁若无人地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活。在萧瑟的冬日寒风中，路旁的小草飘洒一地，对面山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假期结束了，又要离家上班去了，把身上的钱给爷爷奶奶和父母各自留了一点，母亲坚持不要，说：“你自己一个人孤身在外，在家干日好，出门一时难，你自己留着谈朋友花。”

回到单位，打电话跟家人报个平安，父亲在电话里一再叮嘱我：“我们身体都好好的，爷爷奶奶在家你不用操心，你自己要好好学习，注意身体。”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家人身体健康，做儿女的心里随时有个家，老人们的心里有牵挂、盼头，这就是幸福！



直很好，耳不聋，眼不花，牙也很齐整，睡眠和胃口也好，就是人老了，脚软，拖不起身子，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父亲背衣肥上地里去了。冬天，正是给土地补充农肥的季节，开春就可以直接下种。母亲为我煮了碗鸡蛋面，真香。

白天每日跟着父母在田间劳作，傍晚陪爷爷小酌几杯，生活清闲恬淡。闲来无事，搀扶着爷爷奶奶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散步。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冬耕的老牛，旁若无人地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活。在萧瑟的冬日寒风中，路旁的小草飘洒一地，对面山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

假期结束了，又要离家上班去了，把身上的钱给爷爷奶奶和父母各自留了一点，母亲坚持不要，说：“你自己一个人孤身在外，在家干日好，出门一时难，你自己留着谈朋友花。”

回到单位，打电话跟家人报个平安，父亲在电话里一再叮嘱我：“我们身体都好好的，爷爷奶奶在家你不用操心，你自己要好好学习，注意身体。”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家人身体健康，做儿女的心里随时有个家，老人们的心里有牵挂、盼头，这就是幸福！



## 余秋雨：记忆文学

34

李小林也看了我一眼。我立即直觉到，她也恐惧着，而且恐惧的内容和我差不多。

原来，李小林的爸爸巴金当初揭露的“伪斗士”张春桥、姚文元，这时已经高升到北京，参与领导全国的“文革”。因此，上海作家协会的作家们心领神会，闻风而动，纷纷贴大字报、写文章揭露巴金的“历史问题”，说他是“反共老手”、“黑老K”、“为帝国主义提供反华炮弹”……在家里，巴金的妻子看到报纸上有其他作家批判丈夫的一篇文章，就藏来藏去不让丈夫看到，而巴金也做着同样的事，藏着报纸不让妻子看到。

不久，巴金在北京的朋友、另一位作家老舍也出事了。那天，一位与他差不多年纪的老作家当着是一群中学生的面愤怒揭发老舍的“历史问题”：在美国时领过美元稿酬。中学生起哄，老舍当天就投水自杀了。他没有力量与眼前这些已经“大民主”了的作家和学生辩论：在人民币还没有创立的时代，美国无法用它来支付稿酬。

我正呆呆地坐着发愣，忽然听到教室楼下有人在高喊我的名字，声音有点耳熟。

到窗口一看，是高中的两个老同学，一个姓许，一个姓万。好几年不见了，我赶紧下楼，拉他们到操场边的草地上坐下说话。

他们很焦急，说是昨天回了一次母校，发觉我们中学里的老师至少一半都有了“历史问题”，贴满了大字报。

教英语的孙老师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美军翻译。大字报说，他很有可能顺便做了美国特务；

教历史的周老师的祖父考上过清朝进士。大字报推测，极有可能见过慈禧太后，既然见了就一定有政治勾结；

教地理的薛老师在课堂上说法国地图像男人的头，意大利地图像女人的靴，却独独把中国比作动物，说是像一只大公鸡，显然是汉奸；

教生物的曹老师的“历史问题”在时间上最近，那就是他在饥荒年代偷窃过烘红薯；

……

我一听，说：“这一定是教师们互相揭发的。你们想，曹老师的烘红薯事件，后来的小同学们怎么知道？还有什么美军翻译、清朝进士……”

许同学说：“现在最麻烦的是孙老师，美国特务，不能回家了，关在生物实验室的一个笼子里。”

“笼子里？”我惊叫一声。

我们三人，花了一个小时想出了一个营救方案，并立即实施。他们两位到街上买了两个造反队的袖章戴上，回到中学，冒充毕业生要“揪斗”孙老师。中学生造反队毕

竟是孩子，看到两个戴着造反队袖章的老校友站在前面，已经矮了半截，提出可以用一百张写大字报用的白纸换出孙老师。

我的那两个老同学一听有门，就假装认真地与他们讨价还价，结果只用了三十张白纸，孙老师就转移出来了。

“好险！”事成之后的一星期，他们又来找我，庆幸地说：“如果再晚一天，这样的事就做不成了。现在中学里已经成立了教师造反队，接管有历史问题的教师。”

他们告诉我，教师造反队的司令，就是曹老师。他实在受不住“偷窃烘红薯”这个罪名，干脆成立了一个“红薯造反队”。旁人一听，以为是郊区农民揭竿而起。这在上海是稀奇事，因此在全市造反派联合会议上让人高看一眼。

曹老师当了造反司令，会怎么样呢？我们又为孙老师担忧起来。万同学的家离中学最近，我们要他常去看看。半个月后他又来找我，说孙老师不仅没事，而且也参加了红薯造反队。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师戴着造反队袖章，看上去非常古怪。

“是不是曹老师想用这种方法保护孙老师呢？”我问。

“有可能。很多老师都参加了红薯造反队，因此也有对立的造反派刷出标语，说红薯造反队应该改名为黑薯造反队。曹老师厉害，到我们劳动过的青浦农村拉了一个老农民来做副司令。那个老农民站在凳子上用谁也听不懂的乡下话乱喊几声，对方就不吭声了。”万同学说。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徐建国